編 者 按

本期三篇思想史研究論文的議題互不相關,但卻有着共同的關切。這就是:近百年來具有強大深厚傳統資源的中華文化如何接受外來文化,並在社會鉅變中建構本民族文化的新傳統。

葛兆光的文章,生動細緻地勾劃出近代中國佛學復興的過程。一方面,日本明治時代的佛學界有意促進中國佛學復興,以聯手對抗西洋文明,特別是基督教東進的大潮;另一方面,追求富強的中國士人也「誤讀」了日本明治維新,以為「日本勃興,實佛教為原動力」,從而造成「種瓜得豆」的現象。中日佛學交流互動的結果是唯識學興起,它提供了從科學、哲學解釋佛學,又從佛學理解和接受科學的基礎,成為中國近代思想轉化的重要資源。

另外兩篇是去年「中國近代歷史的社會學闡釋」會議論文。雷頤的文章詳盡地分析了30年代中國農村社會性質論戰中,一批受過現代西方學術訓練、信仰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學家,用「科學」方法做農村調查,論證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為40年代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形成奠定基礎。金觀濤的文章,則質疑以往過份誇大科學主義是五四知識份子接受唯物史觀思想基礎的論述。他認為,除外來思想以外,晚清以來的近代傳統——即從儒學內部來批判並超越宋明理學的思潮,才是促使中國知識份子接受唯物史觀的內在原因。